

【文学艺术】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

王兆阳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有催化助长之功,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关键词: 明治文学;梁启超文学观念;更新

中图分类号: J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3-0052-03

Study of the Renewal of Liang Qichao's Literary Conception

WAN G Zhao-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 group of literary giants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Meiji Restoration tremendously promoted the renewal of Liang Qichao's Literary conception and with the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s Literature,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had been affected greatly at that time and had been since then.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in Japanese Meiji Restoration; the Literary conception of Liang Qichao; renewal

一、日本政治小说对梁启超的影响至关重要

梁启超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呼吸着西学的新鲜空气,“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

在梁启超文学观念的转变中,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已经接触到日本政治小说了,康有为早年购买的日文书中,有不少政治小说,一般流行的作品几乎都已收藏。1896年康有为自编《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政治、法律、文学、美术等十五门介绍日本书籍。其中小说类中诸如《花柳春话》《春莺啭》《佳人奇遇》《经国美谈》《花间莺》《雪中梅》《绿菴谈》等均有藏品。梁启超写过一篇《读〈日本书目志〉书后》^[2],由此推知梁启超有可能读过上述政治小说中的某几本。梁启超还为黄遵宪的《日本图志》作过《后序》^[3],而该书是介绍当时日本情况最详实可靠的著作。这样梁启

超间接地了解到日本普及教育对于文明开化的作用,认为改良小说有利于推动政治上的改良。在1897年9月,梁启超到湖北,看到友人叶浩吾、汪甘卿办起《蒙学报》,门人章仲和及其兄伯初办起《演义报》,便为两报写了一篇序,其中谈到“日本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郑重地宣称“救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

虽然,他的推论有不妥之处。日本政治小说的兴起,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上的自由民权运动,为了启蒙民众。而明治维新发生在倡导政治小说之前,是自上而下的倒幕运动,倒幕运动依靠的中下级武士,并没有利用通俗小说获得人民的支持。但梁启超从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面貌这个事实出发,把此后的政治小说也看作改良之利器。

有确切记载的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的联系是: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发生后,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逃亡日本,在东渡的日本大岛兵舰上,便已开始阅读并翻译政治小说。据《任公先生人事记》载:

收稿日期:2002-06-26

作者简介:王兆阳(1947-),男,陕西西安人,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教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般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随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4]。

1898年11月11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佳人奇遇》即开始在该刊“政治小说”栏连载,至36册。又续刊《经国美谈》,到69册全部载完。在1898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上,他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第一次提到“政治小说”的概念。他从一般地讨论小说的启蒙作用,转而专论“政治小说”的奇效:“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又说:“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并提出“采各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现,但他的小说理论,特别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观念,不再轻视文学,而是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对政治小说尤其倾心,他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中,梁启超再次谈到日本政治小说由翻译发展创作的经过,表达了自己欲以小说抒发胸臆的热望:

于日本明治之大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最著作,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关直彦氏之《春莺转》、藤田鸣鹤之《系思谈》、《春窗绮语》、《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高。呜呼!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块垒磅礴错综繁杂者,而一一熔铸之,以质于天下健者哉!

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小说发展

的概貌是有清晰认识的。

日本的政治小说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发 展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对下层人民的盘剥,老百姓不堪其苦,暴动不断,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政治家,为了启蒙群众,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灌输新的观念,就必须利用通俗而易于普及的形式,政治小说便一下子受到青睐。

在此之前,日本文学中,小说与戏剧、俳谐、狂言、歌舞伎、净琉璃等也属于末流,为正统文人所不屑。民权运动的理论家、政治家们也为确认小说的地位和价值做了热烈的讨论。1886年2月,高田半峰在《中央学术杂志》的《佳人奇遇批评》中提出小说为“文章(指文学)之最上乘”。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还把小说作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手段,认为小说有娱人教人的特殊作用,提倡小说改良。

与之相应,梁启超也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这实际上是把小说改良确认为社会改良的前提,这种提法,在梁氏出国之前是找不到的,

梁启超还认为,正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感人至深,当然,好的文学作品都有这种力量。但在诸文体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5]。

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发展脉络作了论述,又提出了与日本政治小说理论接近的小说理论,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日本政治小说对他的影响。他的小说理论融和了外来的文艺观点。他在异域流亡生活中,敏捷地找到了适应中国当时政治斗争的宣传武器;很难说,他这种观念更新带有多少艺术上的自觉,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推进中国文学观念更新的作用。

二、明治时期作家德富苏峰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新文体的顶峰时期,便是他创办《新民丛报》的时期(1902),这时日本“言文一致体”已在文学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纵观梁启超所写散文的特点,无不深受日本文坛提倡“言文一致”和通俗文体的影响。

梁启超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来

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宗旨,与矢野龙溪的四体兼用有无法化解的渊缘;同时,也受他所推崇的福译谕吉“力求避免费解之词,而以平易为主”,用俗语文体传播他国文明思想这种原则的启迪。他打破了统治当时文坛的桐城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类“旧文体”,把散文从“旧文体”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其胸中所欲言”,“取万国新思想(即欧美等国思想文化),以贡于其同胞”,而且好以日本语句入文,其中所取日本思想或日本文体,或经过日化的欧美文思,尤其是矢野龙溪和福译谕吉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明治时期的作家对梁启超影响最深的要算德富苏峰。如《夏威夷游记》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中所说:

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谈》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并文雄放雋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于是也。苏峰在日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6]。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各种报刊纷纷出现,许多政治家从事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的工作,德富苏峰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在1886年所著《日本之将来》及1881年2月所创刊的《国民之友》,从思想、形式到文体都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他不过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内田鲁庵回忆道:

“德富苏峰挈《日本之将来》从故乡入京,突入帝都之论坛,续以创刊《国民之友》文名隆隆,势压天下。当时青年之于苏峰皆望风倾倒,《国民之友》殆有号令天下思想界之势”^[7]。德富苏峰以报刊为阵地,宣传自由民权思想,是政界、报界的风云人物。

梁启超对德富苏峰十分敬仰,在1899年和1903年两次写信给德富苏峰,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口号也是读了德富苏峰的书刊之后提出的。梁启超不仅对苏峰的文章非常赞赏,而且积极翻译刻意摹仿。德富苏峰的文章搏采中、西、日之文思,文体之长,他的《烟土披里纯》一文就引用了《史记》中的《李广传》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的话,还有日本的国歌、法国雨果的名言、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欧文直译体和汉文调,共同构成苏峰特有的行文风格。梁启超新文体的形成过程深受这种风格的浸染。

除政论、杂文之类,梁启超还写了许多传记。人物传记是新文体的主要形式之一,如《康南海先生

传》《新会谭公略传》《戴东原先生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梁启超在《李鸿章》序中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全书分十二章,章有题,题下又列细目,以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为背景,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并取中外古今人物加以比较。

其实,梁启超“全仿西人传记主体”的传记,多为日人学西人传记的再模仿,在明治三十三年以后,日本也出现过创作传记的热潮,德富苏峰的传记作品,也很有名,他的《吉田松阴》就采用了西方评传的形式,很受日本读者的欢迎。德富苏峰自言:

题云《吉田松阴》,其实不过是以松阴为中心,观察其前后之大势,潜移默化之现象而已。

若使其名实相副,或者改为《维新革命前史论》亦无不可。

这种通过一个人的一生事迹的述评来考察一个时代的传记作法,梁启超在《李鸿章》中加以吸收借鉴。《李鸿章》一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李鸿章》第十二章(结论)中,还采译了德富苏峰评品李鸿章的一篇短文。在评论人物时,没有传统碑传中常见的谀人谀墓的谀词,改变了旧体碑传等类文体散文的格局与风格。

矢野龙溪“杂用四体”和侧重“欧文直译体”,福译谕吉的“俗语文体”,德富苏峰的“以欧西文思入日文”^[8],这些明治文坛的杰作都对梁启超新文体的形成有催化助长之功,其思想、文体不仅为梁启超接受,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夏威夷游记 [M].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1941.
- [2] 梁启超.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M]. 上海: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 1898.
- [3] 黄遵宪. 日本国志 [M]. 上海: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 1898.
- [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 [M].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1941.
- [6] 丁文江, 赵书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7] 黄遵宪. 沈氏音学序 [M]. 上海: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 1896.
- [8]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绪言 [M]. 日本岩波书店, 1981.